

← (上接2版)

表格简化到了极致。这样做的目的是考虑到当时新政府尚无进行全国范围内人口普查的经验,历史上可以借以参考的经验也很少,而工作人员整体素质的限制加之当时进行人口调查的时间十分仓促,因此最终只选择了最基本的五个项目作为登记表的内容。有关部门在制定计划时,还曾经讨论了在方案中是否需要加入教育程度、职业、社会成分等内容[克拉戴维奇(苏联):《中国1953年全国人口调查》,统计出版社1956年版,第16页],但在讨论过程中一一给予否定。教育程度在当时的中国是个很难判断的填表项:受过现代大、中、小学教育的人只占很小比例,有些人读的是私塾,有的人曾经是举人,有的人识字,有的人只识部分字,大部分人是文盲,因此很难统一到一个项目中进行填写。如果要制定出一个科学的标准,这将大大增加整个普查的工作量,并且很有可能限于当时大部分工作人员的学识和理解力,可能出现登记中错误颇多的情况,如果这样,就失去了统计的意义。在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职业一项就由于划分标准不清晰以及工作人员和老百姓的误解而最终错误太多,无法进行统计。至于社会成分,当时除了少数精神病患者和被依法剥夺权利者外,其他公民都有选举权,因此也成为了不必要的项目。并且,填写社会成分还会增加群众的疑虑而增加了调查工作的难度,因此这个项目也被否定。事后看来,当初将调查项目精简到如此之少还是非常英明的,这对后来加快人口调查登记的进度,减少登记过程中的错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人口调查登记表的设计充分体现了结合中国实情的考量。甲式表针对的是家庭

住户,其中分为常住人口和在外人口两部分。那些在机关、部队、学校、工厂、农场、建筑工地等单位长期离家的人口按规定是不能在他们家中登记为常住人口的,但中国人是十分重视家庭观念的,如果在人口登记时不登记那些常年不在家或者已经离家6个月以上的人,他们的家人就会觉得委屈,因为亲人们认为这些人仍然是家庭不可分割的成员。有的人甚至以为对他们不进行登记,自己的亲人以后就无法回来了。因此,进行人口登记时,住户肯定会坚持要求将家庭内所有成员,不论是否常住都登记入册。考虑到这种情况,甲式人口调查登记表就分成了常住和在外两部分人口,而统计人口时仅计算右边的常住人口,左边的在外人口就不作计算。这样既照顾到中国人的传统和习惯,又不影响调查工作的准确性。此外,中国当时很多妇女没有自己的名字,有些孩子长大后也没有正式起名,而是沿用自己小时候的乳名,因此《人口调查登记表填写说明》中规定,“对于无名者,可于其姓下填写其习惯称谓或乳名”。

1953年的人口普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口普查,进行直接普查的人口超过5.7亿,是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整个普查过程动员了250多万名工作人员,这还不包括居民中协助调查的积极分子。此次人口普查是中国成功确立现代人口普查制度的标志,它协助了户籍制度和计划经济体系的建立,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口政策的节育转向,并为此后历次的人口普查提供了宝贵经验。

本文写作参考《人民日报》关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相关报道和上海市档案馆关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相关档案。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讲师)

库寿龄的上海岁月和汉学贡献

王国强

库寿龄生性不喜社交、不善言谈,甚至被合作者指为“怪异”。但他在汉学上精通汉语,兴趣广泛,有学术头脑,是一位有潜质的侨居地汉学家。无论是个性还是学术,海纳百川的上海无疑更适合他。



库寿龄

英国人库寿龄(或译库林, S. Couling, 1859—1922),是一身而兼多任的近代来华人士:传教士、教育者、学者、编辑、文物搜藏者。库寿龄一生的最后十余年,基本上侨居在华洋杂处的上海。上海时期的库寿龄,将其在汉学方面的功力和积累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造就了他著名侨居地汉学家的声誉。

库寿龄其人

库寿龄1859年生于伦敦,是家中幼子。由于家境窘迫,富有学者品味的父亲并未能够给予库寿龄优越的学习和成长条件。尽管天资聪颖,但库寿龄的求学之路并不顺利,他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到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了。过了两三年,库寿龄萌生了追随其父从事传教工作的心愿,在18岁时进入布里斯托浸信会学院学习。在此过程中,库寿龄对中国产生了兴趣。

1884年,年轻的浸信会牧师库寿龄离开英国,目的地是中国山东。从1884年开始,一直到1908年,库寿龄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山东度过的。他在青州等地学习语言、教书育人,并利用归国休假的机会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历学位和知识水平。应该说,这是库寿龄重要而漫长的成长期,他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汉语水平,还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硕士学

位,甚至两次被邀请到山西大学任校长(均被库本人以想留在教会为由拒绝了),但在传教和教育方面却遇到了诸多不快。浸信会在山东的教育政策,在1904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库寿龄对此颇有保留。在历经数年的挣扎后,库寿龄于1908年脱离浸信会,并离开了生活长达二十余年的山东。

离开山东后,库寿龄几经辗转,最后选择了侨居上海。上海时期的库寿龄,同样扮演着多重角色。库寿龄担任过家庭教师,积极参加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的活动并于1914年起担任名誉干事和编辑的职务,1919年代理上海麦伦书院(Medhurst College)院长一职并创办著名的汉学刊物《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在这些丰富的社会和文化活动之外,库寿龄还不忘著述,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并编写了重要的专书《中国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Sinica)和《上海史》(The History of Shanghai)。晚年的库寿龄,不断受到一种罕见疾病食管憩室的折磨,加上长期而繁剧的劳作,不幸于1922年6月15日在上海辞世,享年62岁。

库寿龄的上海岁月及其汉学成就

库寿龄离开教会的决定,在库寿龄夫人为其撰写的“讣告”中被称为“悲剧”。但从汉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正是这一决定促使库寿龄最终选择上海,并在这个文化交流中心充分发挥了自己在汉学研究领域的才智;如果说山东时期是库寿

龄汉学生涯漫长曲折的准备期,那么上海时期则是“开花结果”的全盛期。上海时期的库寿龄,汉学上的贡献大致可分为著述和编刊两大方面。

在汉学论著的写作和发表方面,库寿龄在此阶段共发表各类文章十余篇,并完成了两部较为重要的专书。就笔者所见,库寿龄在上海时期所发表的署名文章以书评为主(主要评介其时西人关于中国古物的书刊),此外有关于河南所发现之甲骨和介绍莫理循文库的文章各一篇,这些文章大都刊登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库寿龄编辑《新中国评论》时,也以编辑的身份发表了一些文字,以编刊相关事务和汉学人物介绍为主。库寿龄的上述文章,大部分可视为其山东时期甲骨收藏与研究的继续,但学术性有限,无法与下文要讲的两部专书媲美。

首版于1917年的《中国百科全书》,应该是库寿龄在汉学方面的代表作。此书有六百余页,集伯希和、柏永年、伍连德、佐原笃介等中外人士之手笔,用百科全书的方式全面介绍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涵盖面之广足以展示主编库寿龄在汉学研究方面的雄心壮志。尽管有批评者认为该书存在过于重视教会史、编纂时机不够成熟、某些重要人物缺失、部分词条不够严谨等各种问题,但更多的则是来自汉学界的肯定和赞誉。《中国百科全书》出版隔年,便获得了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这是对库寿龄辛勤劳作的最大肯定。由于该书内容广泛且充实,出版后一直被想要了解和研究中国的人士阅读和引用,甚至赢得了“巨著(magnum opus)”的美誉。《中国百科全书》初版至今,已至少于1964年、

(下转4版) →

